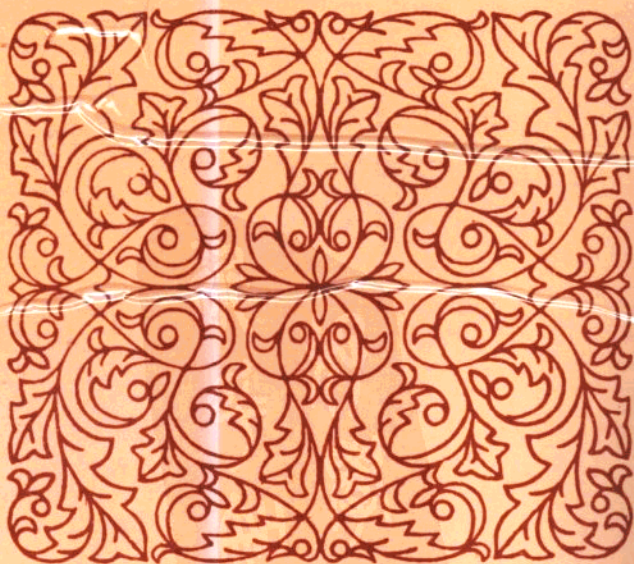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59 •



PDG

本書據大東書局1932年版影印

編者導言

近代科學的宇宙觀之發展，使人類對於一切有了正確的觀念。第一箇科學上的革命家就是哥白尼（N. Copernicus），他使天體中地球的位置有了正確的觀念，開始了科學的宇宙公律的觀察；第二箇科學上的革命家就是達爾文，他發見物種變化生存競爭的原理，開始了科學的生物世界公律的觀察。歷史中的重要事變或時勢，也是很嚴格的循著科學的規則，也是可以用科學的觀點來解釋的。

可是，一般人對於歷史，多只努力於表面上的研究，誤會叢生。譬如，我們所常說的『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我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每每以爲『英雄』是『時勢』的動力，卻不知『時勢』才有力。量造出『英雄』。任何偉大的個人終難逾越物質環境的範疇。

對於歷史的研究，我們要遵循一位最光榮的學者斯密斯教授（Prof. G. E. Smith）在最近的一篇關於『原始人類』（Primitive Man）的講演中所說的，他說：

『無疑的，原始人類還是繼續像他們的猿類祖先所慣常做的一樣去消磨他的時光，主要地是尋找食物與防止危險；可是他們在那種關係他們的重要的幸福的觀察和判斷中得到了大為增加的能力，得到了可驚的本領。那種假定他們消磨他們的時光於懷想他們的周圍的世界的，於觀察在他們的頭上的星辰的性質的，於創立靈魂的學說的近代謬誤之遠離於事實，恐怕要像以為普通的近代英國人都在用心研究動物學，天文學，和哲學一樣』。

這是純粹不作虛偽的科學的歷史觀，下面一段，把他的科學的歷史觀表現得更為明顯。他接著又說：

『這種觀察是不曾想到人類思想的特點的。人類不集中他們的注意力於那些特別的問題，除非有些確定而明顯的環境迫著他們那樣做。日月在原始的人類本是不當爲科學的好奇心的目的物的，一直等到一些很特別的理解力，大概是被初期的農業試驗中的某些環境所激動的，逼迫了他們對於那些似乎影響著他們的生活方法的事情用一些思想』。

這是對於歷史研究的唯一的科學的探討。

本書就是根據這種科學的觀點而編成的，因爲祇有科學的智識，方能夠引人走向真理的道路。『等到這箇方法用在精神科學上的時候，便能對於支配歷史的勢力有一種新的見解了』。(Müller-Lyer: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第四卷)

本書主要地是在糾正一般人對於歷史的誤解，使讀者能從這本書上

所述的一切解釋之中，得到對於歷史的動力之正確的認識。其中關於美國內戰問題是舉例；藝術問題是討論的性質，在本書中只能作為附錄。

最後，還要聲明的，本書不是創作，不過是根據歐美學者的著述來編成的。所根據的書主要的是克拉克的『歷史叢論』（Clarke: Essays on History），其他如伏爾佛遜（S. y. Wolfson），拉波播爾（Charles Rappoport），范格里夫（Fairgrieve），勞爾士（Knowles），孫普爾（Scmple）諸歐美學者的著作也引用不少。

編者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

歷史動力論 目次

編者導言

第一章	英雄問題	一
第二章	地理動力觀	一八
第三章	心理動力觀	四
第四章	道德因素問題	五
第五章	歷史與宗教	七
第六章	思想之來源	八
第七章	從美國內戰來觀察	九
第八章	藝術之基礎	一三
第九章	藝術與社會發展	一六

第十章

結論

.....

歷史動力論

第一章 英雄問題

我們常常聽見說，人類是他們的命運的主宰，是能夠超出經濟狀況之上的。然而人們所謂『經濟狀況』正確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他們認為是保障私利，我們是同意的。如果牠的意義是在於人的活動而不是大部分被他的時代和地位的經濟條件所限制，我們便不同意了。凱撒 (Julius Caesar) 未曾帶著榴彈礮渡盧比康河 (Rubicon)，克魯紗達爾 (Crusaders) 未曾坐著汽車經過歐洲，哥倫布未曾用過輪船式的船舶而發現美洲，乃至加里太子 (Prince Charlie) 未曾用過火車輸送他的蘇格蘭高地人往返於大爾比 (Derby) 之間。如果歐洲人發現：英國陸地測量簿的第一版沒有

用印刷機來印刷，英國十五世紀的詩人喬賽（Chaucer）沒有用自來水筆做詩，巴絲女王從沒有看過電影，那對於世人是有趣的事，而對於另一部分的人卻又簡直是新聞了。

對於任何有理解力的人是沒有『絕對不變的歷史學說』的。歷史不是一種精密的科學，牠只是部分的社會科學。人的原素，或『人的精神』，是一種極不能確定的數量，除了笨伯而外，沒有人會預備提出關於人類行為的『絕對不變的』學說。然而，人性的明顯的成分是變化極少的或死板板的，同時雖然沒有人能夠預知將來（『預言』是最無理由的謊謬語），然而人類不變的精神給我們以研究過去的和現在的歷史的原理的決定的方法。現在的人類是一箇寬大與貪婪的，機敏與狡詐的，博愛與殘忍的，勇敢與懦弱的，智敏與愚鈍的混合物。一千、二千、乃至五千年以前，有史以來人類都是絲毫不變的同樣的。大衛德王（King

David) 與赫里辛格 (Hari Singh) 或摩理思 (Hayley Morris) 之間，亞希班里波 (Assurbamipal) 與已故的利歐普爾王 (King Leopold) 之間，達理克 (Sir Francis Drake) 與飛希大將 (Fisher) 之間，太勒 (Wat Tylre) 與格拉奇 (Willie Gallacher) 之間，墨格萊 (Ferland Magellan) 與亞曼德蓀 (Roald Amundsen)，或培根 (Roger Bacon) 與越姆西 (Sir William Ramsay) 之間，根本上都沒有精神上的不同。如果說一切的人有共同心理與精神的屬性，那是一箇庸俗的觀察，而是有巨大的區別的，箇體的特性問題大都具有這些屬性的程度問題。

『最潔淨的米穀在篩過之前也會有一些沙泥的。』

同樣，如加寶爾 (Carlyle) 曾經說過的，世上最爲人所不齒的鄙夫在他的身上也隱著一些神聖般的光輝。

歷史是人所造成的。動物沒有造成歷史。人類創造歷史所用的形式

，總是依照那些財富的生產方法過去與現在的，和以那些方法為基礎的社會關係而決定的。這是與說一箇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只是因為他被物質的利益所驅使著，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許多人還是像這樣的說。他們對這箇問題的智識或是空虛的，或是已經得著他們由對於這箇法則糊亂的批評中所有的知識。物質的利益未曾引起那已故的凱爾哈地的一箇單獨的吶喊，也沒引起在他整箇生涯中他所做的一箇單獨的公開的行為與舉動。凱爾哈地是以他在國會中的鬭爭，他在礦工的組織中的工作，以及創立獨立工黨造成了歷史。『在實質上他不曾爲自己著想過，反是他在努力於做有價值的犧牲，他的勇氣是堅強的，他的誠心也是同等的堅強的，他是誠懇而頭腦清晰的人』：一箇人對凱爾哈地是可以隨意的造出冗長的頌詞，尤其是可以拿着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以及他對歐文的崇拜，推測那感動他的不可捉摸的東西。不管怎樣說，那件牢不可破的事總

是具在的，凱爾哈地的一生之所以聞名的而他的名字之所以成爲歷史的，是只因爲他這箇人能在英國資本家之下表現爲被壓迫者爲新社會制度的擁護者。凱爾哈地是因爲他的當時與當地的經濟促成他造成歷史的。

『人的精神』是歷史中的一種『動力』麼？對於這箇問題的一般的回答就是如果沒有『人的精神』，就不會有任何歷史。歷史事實的著作者，卽是歷史事實底負責者。他判斷過去和現在。對於同他的利益、需要、正義和真理的理想，相反的，一律處罰，責其非是。他用箇人道德的名義，或公衆安寧的名義，給過去的世紀以德行的評價，或嚴厲的提訊之於『歷史的衙門』之前。他是榮顯和貶黜底區劃者，各世紀與各英雄的聲譽，由他造成和恢復。對於被輕視的世代，則予以罪大惡極之名，而於人類爲行善有功之人，卽爲之建修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塔，他把一箇亞第拿（Attila），一箇多格碼大（Torguemed）一箇拿破崙（Napoleon）

一箇佛蘭梭瓦大西士 (François d'Assises) 一箇巴士特 (Pasteur) 造成代表的名字，可紀念的人，使我們照其施於人類的影響，而作恐怖的太息，或表示無限的欽佩。已往的歷史教科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暈光以決定平民的命運，變換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現和發明，優待和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和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這般歷史家中有一位甚至說：埃及女王克麗阿巴特 (Cleopatre) 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梯姆 (Actium) 戰爭的原因；還有一位也說：滑鐵盧 戰爭時拿破崙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了一箇方向。

在歷史的研究中，那必然引起最大的注意的，與其說是各箇男女的生平傳記，不如說是制度及運動的起原、勃興、與沒落。羅馬帝國的沒

落是比較康斯坦丁帝的生平更大些的事件；文藝復興事件是較之偉大的羅遠左的行爲更大些的事件；宗教改良是比較馬丁路得與約翰加爾芬的幾種活動更有關係些。羅拉多達芬希的傳記之不是意大利繪畫史，猶之凱爾哈地的傳記之不是英國社會主義史一樣。曾經有一箇偉大的——因爲是最忠實的——人物——牛頓，說了一段最有價值的話：

『我不知道世界上的人當我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在我自己似乎是好像一箇小孩子在海邊頑耍，時常尋著一箇比平常光滑些的石子或美麗些的貝殼，而那在我面前的真理的大海卻全部還沒發現。』

英雄的崇拜，只是在我們追憶那箇英雄所產生的原理或真理的時候，是對的。這種崇拜必定要承認的，因爲這是人性的太有力的而不能全部消滅的一箇要素。然而，偉大的人物不過是歷史發展大海岸邊牛頓式的石子和貝殼，但是牠們並不是大海的本身。

或許曾經發表過的最危險的謬見就是加資爾關於歷史的著作偉人論 (Great Man Theory)。加資爾所認識的歷史不是一箇社會的與經濟的發展問題，而是一箇偉人傳記問題：

『我認爲世界史，那人類在這箇世界中所完成的歷史，根本上就是那在這裏努力過的偉人的歷史。』

文明的——實際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虧得那些曾經『在這裏努力過的凱撒、馬丁路得、富里德里克等偉人。這不是對於加資爾的捏造。

『例如，依照狂妄的加資爾的說法路得在 (Diet of Worms) 所造成的是：

『就我們所知道的，牠是近代人類歷史中的最重要的時期。英國 清教派，英國及其國會，美洲各國，和最近兩世紀的巨大工作，法國革命，歐洲及其目前各地的工作；這一切的起原在乎這一點：如果路得那時做別種的事情，這一切都不得發生了。』

這是何等可憐的胡說！對於路得爲什麼或是怎樣能夠做這種事情不會說過一句實在的話。我們再來引用頗布（Pope）的狂歌：

『自然與自然律隱在夜色之中，

上帝說，「且不管牛頓吧」，一切都是光明。』

加賈爾沒有想到歷史——正確的說來——之說明偉人的產生活動比較一箇偉人的生平的研究之說明歷史還要更可能些。

對於這一點，又用爲對加賈爾的易動的感情作用的一箇糾正，我來向那想了解歷史本質的讀者介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著的社會學的研究中下列的一段文字：

『即使我們容納那樣荒謬的假定，說偉人的產生不依賴其所存在的社會所供給的前提，還會有那種十分具體的事實，在缺乏那些由過去遺傳到他當時的社會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堆積物的時候，他是